

# 秦腔泰斗任哲中

## 人物春秋

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任哲中是国家一级演员,曾任陕西省秦腔协会副主席,2006年,与魏长生、刘毓中6人入选“秦腔名人堂”。他一生倾情于秦腔事业,创立了观众钟情痴爱的“任派”唱腔,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莫辨楮叶的舞台艺术形象,倾倒了大批酷爱秦腔艺术的戏迷,是名播大西北乃至全国的秦腔小生泰斗。

任哲中1925年出生于陕西省永寿县监军镇南关村一贫农家,自幼酷爱唱戏,12岁入范紫东、刘文伯创办的“晓钟社”学戏。他天资聪颖,颇有悟性,能吃苦,有韧性,又具一副天生的好嗓子。在范紫东、孙仁玉、封至模等名家的悉心教导和严格训练下,任哲中很快就掌握了秦腔演唱的基本功。18岁那年,就因扮演《周仁回府》中的周仁而轰动剧坛,一举成名,被誉为艺坛绝唱,有“活周仁”之称,成为上世纪四十年代秀出班行的名角。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任哲中已经以“秦腔小生泰斗”之称享誉陕西戏剧界和西北五省(区)。1954年,任哲中进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秦腔团,在这个秦腔界的著名艺术团体中,他的演艺才华得到了充分发挥,演技更加炉火纯青。特别是他创立的激情饱满、跌宕起伏、刚柔相济、韵味醇厚浓郁的“任派”唱腔,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秦腔戏迷。许多秦腔戏迷至今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任哲中在西安大雁塔的实验剧场连演《周仁回府》三个多月100余场,观众场场爆满。那真是一票难求,买不到票的戏迷,竟然痴痴地站在剧场外面,通过大喇叭听完全场,未了还如饮醇醪地连呼“过瘾”。

平时,走在大街上,只要听到广播里播放任哲中的唱段,不少行人便会不由自主地驻足,个个凝神,仿佛受到孙悟空的定身法似地“定”在原地不动了,直到听完整个唱段才恢复常态。在当时,你去饭馆吃羊

肉泡,如果恰好聊到任哲中,说他的唱腔如何如何好,那执刀的师傅会多切些羊肉给你;如果你说任哲中唱得怎么样,那师傅给你切的羊肉会少得多。这时,如果你嫌肉少而不悦,执刀师傅会说:“你连好坏都不知道,还能知道个多少?”

任哲中的演唱之所以吸引人,关键在于他在塑造人物方面具有非同寻常的领悟力和创造性。他悉心钻研角色的地位、身份、神态和内心世界,深刻体会人物的思想感情,活灵活现地表现剧中人物的心理和情感,让观众随着他的唱、念、做进入一个真切动人的场景,使观众与人物产生共鸣,形成台上台下浑然一体的氛围。据有关专家分析,任哲中的唱腔既继承了传统秦腔的激昂慷慨,又做到了刚柔兼济;既有中路秦腔的传统唱法,又有西府唱腔的特点,同时还吸收了山西梆子和河南豫剧的精华,尤其是在“生角”中融入了“旦角”的细腻、委婉、柔和、流畅的特点,显得奔放、宽阔、嘹亮、浑厚、韵味十足。在《周仁回府》《法门寺》《激友》《软玉屏》《花亭相会》《血泪仇》《祝福》等100多出戏中,他运用深沉哀婉的鼻音、喉音、哭音完美地塑造了进退维谷、忍辱负重的周仁、穷愁潦倒、失魂落魄的张仪,不忘旧情、自责自勉的高文举,诚实守信、淳朴善良的贺老六,义愤填膺、决心杀敌的王东财……这些人物的塑造,个个出神入化,活灵活现,至今无出其右者。到了晚年,他的唱腔音域变得更加宽阔而浑厚,那种略带沙音的声腔苍凉惆怅、婉转细腻、动人心魄、魅力无穷。任哲中,不仅扮相清俊、动作洒脱、表演大气,更具有甩帽子、靴挑纱帽、摇单帽翅等绝活。这些精湛的演技不仅在大西北影响深远,在山西、河南等地以至海外华人中也皆有口碑。

最让同行和戏迷感动的是任哲中的敬业精神。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年逾花甲的他每天仍然坚持和戏曲研究院的中青年演员一起练功,一丝不苟地踢腿、拔筋、吊嗓子、跑圆场,丝毫没有明星大腕的做派。对他的关门弟子胡屯胜更是言传身教,从声腔到动作进行“手把手”教导,使得胡屯胜很快成为引人瞩目的名角。在几十年的演艺生涯中,每到除夕,他或是参演新年戏剧晚会,或



任哲中

是下乡慰问演出,却很少陪家人过年。在一次下乡演出途中,任哲中不慎骨折住进医院,戏迷成群结队到医院探视,甘肃、新疆、边防哨所等地的戏迷连续不断地打电话询问他的病情,还有不少人发来慰问电。任哲中深为感动,于是抱病到电视台为戏迷们唱了几段秦腔,为的是让大家不再挂念和担心。“文革”中,他被打断肋骨,不准唱戏,后又被迫送到永寿县农场去劳动改造。不唱戏的任哲中嗓子难受、坐立不安,于是,他常常在沟边放牧时高唱一阵秦腔,这样他心里才会舒服点。

1995年2月27日,身患恶性肿瘤的任哲中病逝,一颗明亮的艺术之星溘然陨落。得知这个不幸消息,西安的戏迷纷纷涌向任宅的灵堂祭奠,三秦大地的戏迷们连续不断地发来唁电;从任宅到环城南路,挨挨挤挤地排满了花圈、挽联和挽联;长长的文艺路上,络绎不绝的吊唁人群致交通多次堵塞;来自咸阳的五辆大车和100多人组成的牛拉鼓乐队震天的鼓乐响遏行云,展示着戏迷们的悲恸和崇敬;更多的秦腔名家、同道则不分昼夜地在任先生的灵前清唱自己的拿手唱段,倾泻他们的哀思和怀念;来自台湾70多岁的戏迷张公顺以及西安西大街米香亭老人彻夜为任先生守灵……出殡那天,自发前去送别的市民和戏迷将宽阔的三兆路挤得严严实实,他们手执花圈、花篮组成了一条涌动的“河流”。从得知任先生去世的消息起,《陕西日报》连续几个月发表各界人士的纪念文章;《三秦都市报》更是以《誉满丝路十里亭,公推梨园至情,声震三秦一曲周仁,竟成千古绝唱》为通栏标题,不间断地登载纪念秦腔大师任哲中的文章。诸多作家、书法家纷纷撰文、题词,表达他们对任先生的哀悼。

任哲中是秦腔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艺术家。他离开我们已经20多年了,但他不朽的艺术成果和他创立的“任派”唱腔,必将永远留存在陕西、大西北乃至全国民众和戏迷的心里。 □朱耀儒



# 农历猪年「无春」天文历法是主因

随着春节的临近,一则这样的消息在网上甚为流传:根据农历,2019年两头没有春天(立春),民间俗称“寡年”,不宜婚嫁嫁娶。事实真的如此吗?

“这种说法完全没有科学根据,出现这种现象与天文历法有关。”1月21日,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黎耕在接受采访时说,没有立春的现象是由于农历和公历的推算方法不同产生的,而“无春年”不宜嫁娶更是无稽之谈。

## 不同历法差异导致“无春年”

民间所谓的“无春年”“两头春”等都与春节的阳历日期不固定有关。“至于春节的阳历日期为何不固定,那就要从历法的来源说起。”黎耕说。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会把农历和阴历画等号,误以为是一回事。其实,历法分为3种,即阳历(公历)、阴历和阴阳历(农历)。

阳历将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即一回归年定为一,一年划分成12个月,平年365天,每隔4年便要闰一天,加在2月的天数上,即平年2月28天,闰年便是29天,其余每月的天数不变。根据阳历日期,可知寒来暑往的四季变化,但它不能显示月亮的圆缺,这对那些需要根据月相了解潮汐变化的人来说是不便的。

阴历则以月亮的圆缺周期作为一个,一个月29.5天,一年12个月,它完全不考虑太阳的运动规律,因而阴历的日期不能显示四季冷暖。这种历法实用价值太小,现在仅有少数国家使用。

我国现行的农历即是一种阴阳合历,它扬阳历之长避阴历之短,根据月亮的盈亏周期确定“月”,以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即一回归年作为一年的平均长度。农历规定大月30天,小月29天,一年12个月共354或355天,比回归年少11天左右。

“如果只考虑月亮周期,一年12个月就少了10多天,10年下来就是100多天。久而久之,就会出现时序和天时错乱的现象,如冬夏颠倒。”黎耕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便需要添加闰月。中国古代历法很早便采用“19年7闰”法,即在19个农历年中规定12个平年,每年12个月;另7年每年增加1个月,变成13个月,这个增加的月便叫“闰月”。

对此,北京天文馆古观象台王玉民也曾指出,农历19年增加7个闰月后,就大致保证了农历19年内平均一年的长度约为365又1/4日。那么,如果上一年农历没有闰月,由此下一年的春节就会比上年提前11天左右;如果上一年农历有闰月,

## 往事

下一年的春节就会比上年推迟19天左右。所以春节的阳历日期是不固定的。今年立春是在公历2019年2月4日,转换为农历则是戊戌年十二月三十日。可见,2019年没有立春,只是因为立春赶上了农历除夕夜。

## 有无立春无关人类吉凶祸福

“由此可以看出,‘无春年’完全是正常现象。”黎耕说,因为农历平年355天,可能会有这一年恰好落在两个立春之间的情况,就像今年。还有之前的2013年,那年2月4日立春,但农历正月初一为2月10日,腊月三十为2014年1月30日,整个农历癸巳年内都没有



立春节气。再就是“一年两头春”现象。“一般闰月的年份都是两头春。”王玉民说,2014年马年插进一个闰月,共385天。因为一年开始得早,所以正月初五(即2014年2月4日)立春,又因为农历年结束得晚,因此下次立春——腊月十六(2015年2月4日)也在本农历年内,一年两头都是立春,故称“两头春”。当然,也有农历年只有一个立春日的,又称“单春年”,如2011农历辛卯兔年。

“‘两头春’‘无春年’或‘单春年’都是经常发生的,只是正常的历法演变所致,公众不必大惊小怪,更没有必要将其与吉凶祸福等相联系。”王玉民强调。

对此,也有专家认为,寡年可能来自寡年的说法,寡是缺乏的意思,没有立春年份为寡春。事实上,这种无春年和寡年完全没有关系,更不用说与婚嫁娶有什么关联了。 □郝云菲



# 历史上的那些“西京”城

说起“北京”“南京”“东京”,人们都能很快反应过来是哪几座现代城市。这三座带“京”字的城市与日本的京都一道,构成东亚仅存的四座仍然保有“京”字的地名。很多人或许有过这样一个疑问,既然北、南、东三个方位都有各自带“京”的地名了,为何又独独缺了一个“西京”呢?其实,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古代,就会发现中国曾经有过7座被称为“西京”的城市,那么,究竟是哪些呢?背后又有什么样的历史?

## 有实无名的“西京” 西周至西汉的丰镐与长安

丰镐(今陕西西安)、咸阳(今陕西咸阳)、长安(今陕西西安)分别是西周、秦、西汉三朝唯一的京城,并没有明确推行“两京制”,所以也没有正式被当时的政权称为“西京”的城市。不过,由于西周初年周公曾在河洛地区设置洛邑,并称其为“成周”,与宗庙与天子所在的“宗周”丰镐并立,“成周”负责坐镇周王朝在灭商以后得到的东方领土,“宗周”在担当天子居住与宗庙祭祀功能的同时,也有坐镇周王朝在灭商以前的西方固有领土的职能。宗周丰镐与成周洛邑,构成了西周时期在事实上的“东西两京”,为后世“两京制”的最终成

型(东汉时期)奠定基础。西汉王朝始终保持着关中长安的本位政策,洛阳与其他留有官宫的城池没有太大区别,但西汉中后期儒士们已经在以“周公营洛”为标杆,号召统治者迁都洛阳了,王莽的“新朝政权”便响应了儒生的号召,将洛阳升格为“新室东都”,以长安为“新室西都”。“都”与“京”同义,可以说昙花一现的王莽新朝第一次设置了“两京制”,也第一次正式给了长安一个“西京(都)”的京号。

## 逐步正名的“西京” 东汉至隋朝的长安

东汉政权以洛阳为首都(并改名为雒阳),一下子就持续了一百八十年。由于东汉政权需要宣扬自家政权是西汉政权的延续,也就必须尊崇长安。因此,东汉政权便将洛阳称为“东京”,将长安称为“西京”,又将南阳称为“南都”,实行三都制,给予长安、南阳以特殊地位,从而为东汉政权继续维护西汉帝统、宣扬自己是西汉的继承人提供制度上的方便。接替东汉的曹魏政权,继续定都洛阳。曹魏以洛阳为中都,并按照方位设置了许昌、鄴城、长安、淮城四大陪都,并分别配上“四方位”,给予东南西北的称号,这是中

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施行“五京制”。其中,长安由于位于洛阳的西边、曹魏版图的西部,所以继续被称为“西京”,并为曹魏政权坐镇雍凉两州、防御蜀汉政权、西羌与西部鲜卑。接替曹魏的西晋政权并没有设置陪都,西晋崩解以后,有且只有石勒建立的后赵政权曾经以长安为西京,剩下的政权则并没有设置东西两京。

到了北周再度统一北方的公元577年,北周政权在新征服的北齐故土上以洛阳为东京城,并设置了“东京六府官”,“六府”是北周政权设置在新征服地域的地方重镇行政机构,它是对北周中央六府(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的“照搬”,从而直接与中央六府对接工作,北周在并州(晋阳)、相州(鄴城)等北齐当年的重要城市,都设置了这种全权行政机构。那么相对的,北周的首都长安很可能在当时也便被称为“西京”了——不过,由于北周在设置东京后只存续了四年便被隋朝所取代,并没有史料可以直接证明长安在北周末年便被明确称为“西京”。紧接着北周的隋文帝时期,定都长安并且营建北城(隋唐长安城),并没有明确建立“两京制”。隋炀帝在仁寿宫变后接班,方才在营建并迁都洛阳后,以洛阳为东都,以长安为西都,长安也便再次正式成为西京。

隋朝在隋炀帝的一系列暴政中走向了灭亡,李唐政权最终在隋末大乱中重新统一天下。除了武则天时期的武周时期与唐哀宗被朱温控制的傀儡时期以外,李唐政权几乎始终以长安为帝都所在,同时是唐王朝的“西京”。

## 摇摆不定的“西京” 唐朝的长安与凤翔

唐朝在建国以来一直叫长安为“京师”,直到公元742年(唐玄宗时期)才第一次以长安为“西京”。公元757年,由于唐肃宗曾经在凤翔府(今陕西省凤翔县)驻跸指挥平定安史之乱,因此改以凤翔府为“西京”,改称长安为“中京”。公元762年,由于安史之乱逐渐平定,便不再称呼凤翔府为“西京”,中京长安也被改称为“上都京兆府”,这个称呼一直沿用到唐朝灭亡。

在整个唐朝,长安被明确设置为“西京”的时间只有短短15年(公元742年到公元757年),凤翔被明确设置为“西京”的时间更短,只有5年(公元757年到公元762年)。但是,长安城毕竟是做了一千多年的西部京师,习惯上还是会称长安称为“西京”。长安之后,凤翔城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二个被明确授予“西京”称号的城市。

在从周朝到唐朝的两千年历史之中,以农耕产业为基础的华夏文明始终以来关中平原与河洛平原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长安(及其前身丰镐、咸阳)与洛阳各自位于关中平原与河洛平原之上,实现大一统与北方一统的王朝也往往将其帝都选在长安或洛阳。这种摇摆于“东西两京”之间的周秦汉唐都规律,其实正是关中与河洛在周秦汉唐时期位于整个华夏文明战略中心的体现,甚至即便官方没有授予长安以西京的称号,民间也会在习惯上称呼长安为“西京”或“西都”,这种习惯甚至影响到了宋元时期,著名元曲大家张养浩的一句“望西都、意踌躇,宫阙万间都做了土”,便是明证。

## “东京”变“西京” 五代十国时的洛阳

后梁政权取代唐朝之后,便以首都开封为东都,以陪都洛阳为西都,而后虽有后唐政权再度以长安为西都,但取代后唐的后晋、后汉、后周乃至北宋,则先后把位于南北大运河枢纽的开封当作首都,并称其为“东京”,相对的“西京”则被安排给了洛阳。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要知道洛阳在唐末以前的历史中,总是以“东京”“东都”为其京号的,却因为关中与中原地区在唐宋之际的持续衰落,而变成了五代政权与北宋政权的“西京”。

除了北方的五代政权有设置西京外,南方十国之中的南唐、吴越两国也有设置“西都”,南唐国的“西都”便是国都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市,与南唐陪都东都江都(今扬州)并称“东西两都”;吴越国的西都则是首都杭州,与吴越陪都东都越州(今绍兴)并称“东西两都”。所以,金陵(今南京)与杭州也

曾短暂做过东周割据政权的“西京”城。

## 由盛而衰的“西京” 宋辽夏金时的洛阳与大同

北宋政权实行“四京制”,分别设置“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北京”大名府(今河北邯郸大名县)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而洛阳作为北宋的陪都,保有了“西京”的名号,洛阳在当时甚至成为中原士人的文化中心。南宋偏安后,只是以杭州为“临安”,在理论上并没有放弃已经被金国所占的北方西京,可以说,洛阳依然是南宋政权在名义上的“西京”。

与两宋政权同期存在的北方辽、夏、金政权,也学着中原政权的模样,设置了西京。辽朝与金朝的“西京”,都是大同府,也就是今日的山西省大同市。大同由于始终处于辽金版图的西部重心地带,所以获得了两百年左右的辽金西京地位。与宋辽金并立的西夏,以其首都兴庆府为“东京”,以军事重镇西平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为“西京”,从而模仿中原政权形成两京并列的形制。

辽宋夏金以后的元明清三朝,在长达七百多年的时间里,均未曾设置过西京或西都,所以西京、西都之名号,便没有像南京、北京那样从“京号”转化为地名,这才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上一共出现过7座“西京”城,它们的名字与对应的设置西京的朝代分别是:

- 长安(陕西西安):东汉陪都、曹魏陪都、北周首都、隋初首都、唐朝首都、后唐陪都、后周陪都、后晋陪都、后宋陪都、后周陪都、北宋陪都
- 金陵(江苏南京):南唐首都、杭州(浙江杭州):吴越首都
- 大同(山西大同):辽朝陪都、金朝陪都、西平(宁夏固原):西夏陪都

□北苑

## 钩沉



唐代李思训绘《长安宫阙图》